

我国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

李 想¹, 李秉龙¹, 张恒春²

(1. 中国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北京 100193; 2.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 北京 100810)

摘 要: 本文利用对北京、辽宁和河北三省市调查所获得的 1033 个农户样本, 运用有序逻辑模型进行数据处理, 分析了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 收入、年龄、健康状况、对合作医疗满意度等因素对所有地区的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均有正向显著影响; 性别、教育程度、婚姻状况、住房面积和结构等因素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差异; 宗教信仰、家庭人口、家庭成员的身体状况以及是否有需要赡养的老人等因素对我国不同经济发展地区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

关键词: 生活幸福感; 生活满意度; 农村居民; 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 F1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980X(2009)05-0098-06

生活幸福感(happiness)也可以称为生活满意度(satisfaction)、主观福祉(subjective well-being)、福利(welfare)或者效用(utility)等,是人们对自身目前生活总体质量进行评价的全面肯定程度,换句话说,就是人们在多大程度上喜欢自己目前的生活状况^[1]。关于幸福感的实证研究,欧美学者在 20 世纪 60 年代起从心理学、医学的角度对心理健康进行了研究,而后从社会学的角度开始展开对社会指标体系的研究,继而从经济学的角度对经济学微观经济基础进行了探讨。目前,幸福已成为福利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内许多学者对幸福感进行了研究,其中较多集中在心理学与医学方面;在社会学和经济学方面,更多的研究停留在描述性层面和指标体系方面,利用计量方法对生活幸福感进行研究的较少。

随着越来越多的社会阶层关注幸福感,幸福研究也变得更有意义和更加必要。人们追求尽可能好的工作、尽可能高的社会地位、尽可能多的权利和金钱,并不是为了这些事物本身,而是因为它们能够带来幸福感^[2]。也就是说,对幸福感的研究不仅要关注幸福本身,还需要围绕可能对幸福感产生影响的各种因素展开。所以,研究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有重要意义。本文拟考察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

区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都有影响的因素,就应成为国家公共政策制定时力争改善的方面,这样才能使制定的国家公共政策可以最大范围地发挥作用;而只对特定区域内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产生影响的因素,则应成为地方政策制定时考虑的重点,地方政府应根据本地区的特点,制定区域政策,以使区域政策发挥最大效用。

本文调查的 3 个地区分别是河北省丰宁县、辽宁省昌图县和北京市平谷区。如此选点的目的是在可能范围内选择农村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的三个地区。河北省丰宁县是国家贫困县,属于高原、平原结合部,农业欠发达,经济发展总体水平较差。本次调查选取的乡镇是选将营乡,该乡地处坝下地区,种植品种以小麦和玉米为主,部分农户养殖奶牛和肉牛。由于没有矿产资源和坝上天然旅游资源,且农业生产条件也较差,所以当地农民收入水平较低。辽宁省昌图县是国家农业大县,地理结构以平原为主,是典型的农业主产区,农民耕地面积较大,畜牧业比较发达,农民生活有一定的保障,但非农经营收入有限,因此总体收入水平的提高也受到限制。之所以选择辽宁省昌图县的太平镇和满井乡作为调查点,是因为这两个地区也是以种植业和养殖业为主,非农产业不发达,属于传统农村地区。北京市平谷区的特点是:四周是山地,中部是平原,农业生产以经

收稿日期:2009-01-07

作者简介: 李想(1982—),男,辽宁铁岭人,中国农业大学经管学院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李秉龙(1957—),男,辽宁沈阳人,中国农业大学经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及农村发展;张恒春(1982—),男,山东青岛人,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农业经济管理硕士,研究方向:农村金融。

济作物为主,区内工业比较发达,农村居民务工较多,收入与纯农业地区相比较。选择熊儿寨乡作为北京市平谷区的调查点。熊儿寨乡是与平谷城区相接的乡镇,该乡农民在平谷区务工人员较多,观光农业和民俗旅游业规模较大,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相对较高。

1 变量特征

本文选择以下3类解释变量:①个人特征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健康状况、婚姻状况、宗教信仰、政治面貌、是否参加合作医疗、对合作医疗是否满意;②经济状况变量,包括家庭年人均纯收入、家庭住房面积、房屋结构、是否享受某种社会保障;③家庭结构变量,包括家庭常住人口数、需要赡养老人数、需要抚养儿童数、是否有残疾人、是否有丧失劳动能力的人、是否有大病在身的人。

建立如下模型: $s\text{life} = f(X_1, X_2, \cdots, X_{19})$ 。其中, X_1 到 X_{19} 是影响居民生活幸福感的个人特征变量、经济状况变量和家庭结构变量,即对应于上述的19项。

本文问卷调查中的生活满意度问题是:“在最近一段时间里,总体来看,您对自己的生活感觉幸福吗?”要求被调查者在幸福、比较幸福、一般、不太幸福、不幸福之间进行选择。生活满意度($s\text{life}^*$)低于一定临界值(c_1)时,农民会感到“不幸福”,高于临界值(c_1)但低于临界值(c_2)时会感到“不太幸福”,高于临界值(c_2)但低于临界值(c_3)时会感到“一般”,高于临界值(c_3)但低于临界值(c_4)时

会感到“比较幸福”,高于临界值(c_4)时会感到“幸福”。但是,我们发现无法观察到这些临界值,因此我们对调查者的回答($s\text{life}$)作出以下规定:回答“不幸福”时取值1,回答“不太幸福”时取值2,回答“一般”时取值3,回答“比较幸福”时取值4,回答“幸福”时取值5。即:如果 $s\text{life}^* \leq c_1$,则 $s\text{life} = 1$;如果 $c_1 < s\text{life}^* \leq c_2$,则 $s\text{life} = 2$;如果 $c_2 < s\text{life}^* \leq c_3$,则 $s\text{life} = 3$;如果 $c_3 < s\text{life}^* \leq c_4$,则 $s\text{life} = 4$;如果 $c_4 < s\text{life}^*$,则 $s\text{life} = 5$ 。

$s\text{life}$ 是非连续序数(ordered)变量,所以在进行回归分析以明确生活幸福感的决定因素时应使用序数逻辑模型(ordered logit model)^[4]。本文使用SPSS16.0统计软件进行序数逻辑模型的估计。

问卷调查于2008年7月和8月进行,分别选择了我国北京市平谷区熊儿寨乡下属两个村的176位农民、昌图县太平镇满井乡下属4个村的502位农民和丰宁县选将营镇下属两个村的355位农民,共得到有效问卷1033份。本文的分析对象是个体的感受,所以调查是以个人为单位,而并非以农户为单位的。在抽样方式的选择上,本研究使用的是概率抽样方式中的整群抽样,即对被选择的地区逐户调查^[3]。调查对象为家庭常住人口中的成年人——因为调查期间并不是农忙季节,多数青壮年劳动力已外出务工,所以被调查者以中、老年人居多。

表1列出了变量的定义,并给出了这些变量的特征值。

表1 变量的定义及特征值

变量		单位或定义	符号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A. 解释变量							
a. 个人特征变量	性别	男性 = 1 , 女性 = 0	<i>gender</i>	0.58	0.494	0	1
	婚姻状况	已婚 = 1 , 未婚 = 0	<i>marriage</i>	0.95	0.211	0	1
	年龄	岁	<i>age</i>	43.93	10.918	20	79
	政治面貌	党员 = 1 , 其他 = 0	<i>party</i>	0.08	0.266	0	1
	宗教信仰	有 = 1 , 其他 = 0	<i>religion</i>	0.05	0.227	0	1
	受教育水平	几乎不识字 = 1 , 小学 = 2 , 初中 = 3 , 高中 (中专、技校) = 4 , 大专及以上 = 5	<i>edu</i>	2.71	0.99	1	5
	健康状况	不健康 = 1 , 较差 = 2 , 一般 = 3 , 比较健康 = 4 , 健康 = 5	<i>health</i>	3.8	1.052	1	5
	是否参加农村合作医疗	是 = 1 , 否 = 0	<i>medicare</i>	0.92	0.27	0	1
	是否满意医保补偿标准及实施情况	是 = 1 , 否 = 0	<i>satisfaction</i>	0.7	0.459	0	1

续表

变量		单位或定义	符号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A. 解释变量							
b. 家庭结构变量	家庭人口	人	<i>family</i>	3.85	1.288	1	9
	需要赡养的老人数	人	<i>old</i>	0.78	0.973	0	4
	需要抚养的子女数	人	<i>child</i>	1.08	0.877	0	4
	是否有残疾人	有 = 1, 无 = 0	<i>handicapped</i>	0.08	0.273	0	1
	是否有丧失劳动能力的人	有 = 1, 无 = 0	<i>disabled</i>	0.15	0.362	0	1
	是否有大病在身的人	有 = 1, 无 = 0	<i>disaster</i>	0.2	0.401	0	1
c. 经济状况变量	家庭人均纯收入	1000 元以下 = 1, 1000~2500 元 = 2, 2500~4000 元 = 3, 4000~5500 元 = 4, 5500 元以上 = 5	<i>income</i>	2.53	1.255	1	5
	住房面积	平方米	<i>area</i>	82.22	35.957	20	300
	住房结构	泥草 = 1, 砖木 = 2, 混砖 = 3, 钢混 = 4	<i>structure</i>	2.44	0.678	1	4
	是否享受社会保障	是 = 1, 否 = 0	<i>security</i>	0.07	0.261	0	1
B. 因变量	生活满意度	不幸福 = 1, 不太幸福 = 2, 一般 = 3, 比较幸福 = 4, 幸福 = 5	<i>s-life</i>	3.89	1.033	1	5

在个人特征方面,被调查者中 58 %为男性,已婚者占 95 %;年龄最小的 20 岁,最大的 79 岁,平均年龄 44 岁;大部分为小学或初中文化,几乎不识字的占 9.5 %,小学文化的占 33.1 %,初中文化的占 39.8 %,高中文化的占 11.8 %,大专及以上文化的占 5.8 %;党员占 8 %,有宗教信仰的占 5 %;大部分被调查者健康状况比较好,其中自认为身体状况健康或比较健康的分别占 30.9 %和 32.3 %,自认为身体状况一般的占 25.4 %,身体比较差或不健康的分别占 8.9 %和 2.5 %;此外,92 %的被调查者参加了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保险,其中 70 %的被调查者表示对医保的补偿标准及实施情况感到满意。

从家庭结构看,被调查者家庭平均人口数为 3.85 人。其中,每个家庭平均需要赡养的老人数为 0.78 人,需要抚养的子女数为 1.08 人;家庭成员中有残疾人的被调查者占 8 %,有大病在身或丧失劳动能力家庭成员的被调查者分别占 20 %和 15 %。

在经济条件方面,被调查者的平均家庭人均纯收入介于 1000 元~4000 元之间;平均家庭住房面积为 82.22 平方米,住房结构多为砖木或混砖结构;享受社会保障的被调查者占 7 %。

被调查者的平均生活满意度为 3.89,介于感觉比较幸福与一般之间。

2 计量结果

本文分别对三省市的样本进行计算。河北省样本中全部被调查者均已结婚,因此在回归过程中删除了个人特征中的婚姻变量。3 个回归式的最大似

然比(L R statistic)为 166.97、75.24 和 43.66,均高度显著,表明模型的模拟效果良好,应拒绝回归系数均为 0 的归无假设。在 3 个回归式中,解释变量的结果基本一致,而差异则反映了不同地区间被调查者之间的不同。表 2 列出了序数逻辑模型的回归结果。

在个人特征解释变量中,性别的回归系数在辽宁省显著为负,表明男性被调查者幸福感较低,而性别变量的回归系数在北京市却显著为正。可能的解释为:调查选择的辽宁省昌图县太平镇和满井乡作为粮食主产区,男性承担了更多的农业劳动和生活负担,导致生活幸福感的报告偏低;北京市的女性满意度偏低,一方面是由于传统文化下女性的地位要低于男性,导致女性的生活幸福感低于男性,另一方面是因为在非农业主产区男性外出务工者较多,更容易获得高收入,而女性会承担相对较重的生产劳动和家庭劳动,导致女性报告较低的幸福感。

在婚姻变量中,回归系数在辽宁省显著为负。在辽宁省的被调查者中,98.9 %的被调查者是已婚。虽然未婚的样本较小,但是,可能这几个未婚的被调查者报告了相对较低的幸福感的,从而使得辽宁省的这一系数显著为负。然而,由于样本过少,因此不具有统计意义。北京市的这一变量系数不显著。河北省被调查者均为已婚,所以未对该变量进行估计。

年龄的回归系数在三个地区都显著为正,这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被调查者报告较高生活满意度的可能性越高。其原因可以用期望理论来解释:年龄大的人经历了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的变迁,他们对

中国农村改革开放前后特别是改革开放 30 年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有着切身的感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断完善,自身生活水平持续改善,这提高了年龄较大者的生活幸福感。表 3 显示了被调查的三个

地区生活幸福感在不同年龄阶段的分布。从表 3 的统计结果也可以看到,随着年龄的增加,报告生活幸福的人数比例越来越高。

表 2 3 个样本地区的序数逻辑模型回归结果(因变量为 s_{life})

变量		辽宁省			河北省			北京市		
		系数	标准差	显著性	系数	标准差	显著性	系数	标准差	显著性
个人特征	<i>gender</i>	- 0. 309	0. 180	0. 086	0. 021	0. 253	0. 933	0. 576	0. 348	0. 098
	<i>marriage</i>	- 3. 076	1. 058	0. 004				0. 421	0. 613	0. 492
	<i>age</i>	0. 052	0. 011	0. 000	0. 030	0. 023	0. 187	0. 040	0. 021	0. 062
	<i>party</i>	1. 145	0. 636	0. 072	1. 725	1. 148	0. 133	0. 547	0. 417	0. 190
	<i>religion</i>	- 0. 129	0. 293	0. 659	- 1. 334	1. 621	0. 411	- 2. 025	1. 097	0. 605
	<i>edu</i>	0. 201	0. 126	0. 112	0. 291	0. 149	0. 050	- 0. 542	0. 264	0. 040
	<i>health</i>	0. 658	0. 105	0. 000	0. 526	0. 124	0. 000	0. 980	0. 230	0. 000
	<i>medicare</i>	- 0. 464	0. 587	0. 429	- 0. 643	0. 410	0. 117	- 1. 126	0. 672	0. 094
家庭结构	<i>satisfaction</i>	0. 555	0. 232	0. 017	0. 351	0. 253	0. 165	0. 717	0. 521	0. 168
	<i>family</i>	- 0. 035	0. 082	0. 666	- 0. 007	0. 147	0. 963	0. 182	0. 146	0. 215
	<i>old</i>	0. 000	0. 101	0. 999	- 0. 071	0. 120	0. 557	0. 038	0. 230	0. 870
	<i>child</i>	0. 465	0. 143	0. 001	0. 538	0. 219	0. 014	0. 021	0. 250	0. 934
	<i>handicapped</i>	- 0. 098	0. 472	0. 835	- 0. 152	0. 366	0. 677	- 0. 354	0. 573	0. 537
	<i>disabled</i>	0. 115	0. 371	0. 757	0. 001	0. 338	0. 998	- 0. 0170	0. 543	0. 754
经济状况	<i>disaster</i>	0. 182	0. 345	0. 599	- 0. 197	0. 342	0. 564	0. 653	0. 579	0. 259
	<i>income</i>	0. 254	0. 093	0. 006	0. 321	0. 146	0. 028	0. 327	0. 150	0. 029
	<i>area</i>	0. 002	0. 004	0. 578	0. 015	0. 005	0. 001	0. 009	0. 004	0. 038
	<i>structure</i>	0. 126	0. 170	0. 456	0. 828	0. 252	0. 001	0. 212	0. 270	0. 432
	<i>security</i>	1. 020	0. 415	0. 014	- 0. 450	0. 485	0. 353	- 0. 380	0. 548	0. 488
	<i>[s_{life} = 1]</i>	- 0. 322	1. 435	0. 823	1. 187	1. 476	0. 421			
	<i>[s_{life} = 2]</i>	0. 720	1. 416	0. 611	2. 229	1. 458	0. 126	3. 454	1. 936	0. 074
	<i>[s_{life} = 3]</i>	3. 014	1. 420	0. 034	5. 837	1. 488	0. 000	6. 011	1. 956	0. 002
	<i>[s_{life} = 4]</i>	4. 614	1. 429	0. 001	6. 672	1. 498	0. 000	7. 838	1. 998	0. 000
	最大似然比	166. 97		0. 000	75. 24		0. 000	43. 66		0. 000
伪 R ²		0. 407		0. 442			0. 511			
样本数		502		355			176			

注:河北省调查样本的婚姻状况均为已婚,婚姻变量未加入模型,所以河北地区的婚姻变量系数及统计值均为空;北京市被调查者报告生活幸福感为不幸福的样本量为 0,所以 $s_{life} = 1$ 的系数及统计值为空。

表 3 三地区不同年龄阶段被调查者生活幸福感分布的差异

地区	年龄	生活幸福感					
		不幸福		一般		幸福	
		频数	比例(%)	频数	比例(%)	频数	比例(%)
辽宁	1	2	9. 1	6	27. 3	14	63. 6
	2	8	7. 5	30	28. 3	68	64. 2
	3	4	2. 4	56	32. 9	110	64. 7
	4	12	10. 5	18	15. 8	84	73. 7
	5	2	2. 2	18	20. 0	70	77. 8
北京	1	4	7. 7	20	38. 5	28	53. 8
	2	0	0. 0	12	33. 3	24	66. 7
	3	0	0. 0	6	11. 1	48	88. 9
	4	4	13. 3	4	13. 3	22	73. 4
	5	0	0. 0	0	0. 0	4	100. 0
河北	2	8	6. 0	58	43. 6	67	50. 4
	3	18	8. 6	110	52. 9	80	38. 5
	4	0	0. 0	4	50. 0	4	50. 0
	5	0	0. 0	4	66. 7	2	33. 3

注:年龄段的划分标准为 29 岁以下为 1、30~39 岁为 2、40~49 岁为 3、50~59 岁为 4、60 岁以上为 5。同时,为了统计结果展示方便,调查中报告“生活幸福”与“比较幸福”的被重新归类为“幸福”,报告“一般”的不变,报告“生活不幸福”与“不太幸福”的被归为“不幸福”,即由 5 级分类调整为 3 级分类。

是否为中共党员变量的回归系数在3个地区显著为正,说明党员可能有更高的幸福感。其原因可能是农村中的党员更多的是当地各方面条件比较突出的群体。如,党员的平均受教育水平是3.76,被调查者平均水平为2.71;党员的收入水平是3.39,被调查者平均水平是2.53;党员的家庭平均住房面积是98.91平方米,被调查者平均为82.22平方米。

受教育程度变量的回归系数在辽宁省和河北省显著为正,但在北京市显著为负。产生这一差别的原因可能在于辽宁省和河北省的被调查者平均受教育水平还比较低,辽宁省被调查者平均受教育时间为6.51年,河北省被调查者平均受教育时间为8.24年,而北京市的平均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被调查者平均受教育时间为10.91年。这说明农村教育水平的提高并不一定带来幸福水平的提高,文化水平较低的人更容易得到满足,对高层次的需求相对较少;而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农民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以后,会有更高层次的需求,在这些更高层次的需求难以满足的情况下,幸福指数有可能下降。

健康状况变量的回归系数在3个地区均显著为正,这与预期相一致。即:健康水平越高,农民越倾向报告越高的幸福感。

对合作医疗是否满意的回归系数在3个地区显著为正,说明对合作医疗满意的农民拥有更高的幸福感,这与理论预期相一致,即:如果合作医疗能够切实改善农村居民生活,那么合作医疗就能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幸福感。

是否参加合作医疗变量的回归系数在3个地区均为负,北京市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辽宁省和河北省不显著。系数为负表明参加合作医疗会导致生活满意度下降,这与预期有所不同。原因可能有三个方面:第一,调查中发现,参加合作医疗的部分农村居民抱怨未能从参加合作医疗得到实质性的收益,这可能是由于合作医疗的部分制度规定尚未完善,执行中的不公正或者与规定的偏差,导致部分参加了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村居民感到不满,反而会降低他们的满意度。第二,由于合作医疗并非强制执行,很多对合作医疗不满的农村居民从中退出;在被调查者中,北京市、辽宁省和河北省的合作医疗参与比例分别是83%、97%和89%;未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民报告的生活满意度平均值为3.95,而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民报告的生活满意度竟然为3.88,未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民生活满意度相对较高。第三,参加合作医疗的群体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对合作

医疗表示不满意。北京市、辽宁省和河北省被调查者不满意合作医疗的比例分别为28%、22%和44%。以上这3方面的原因使得参加合作医疗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变得不显著,甚至会使参与者报告较低的幸福水平。

是否有宗教信仰变量在3个地区统计均不显著。

在家庭结构变量中,家庭人口数变量和需要赡养老人变量在3个地区均不显著,表明家庭人口数和需要赡养的老人数都不显著影响农民的幸福。需要抚养子女变量的系数在辽宁省和河北省显著为正,表明未成年子女的增加会给父母带来幸福感,原因可能是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地区,子女仍然具有给家庭带来预期收入和保障父母养老的作用;而需要抚养子女变量的系数在北京市不显著,可能是因为北京市有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养老不再完全依靠子女,而且平均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与城市文化的交融也使得当地农民的思想意识有所变化,但北京郊区的子女生活成本也变得更高,因此,在城市边缘地区的农村,子女的价值在于给家庭带来快乐而不是经济价值。

家庭内部残疾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和有大病在身的人三个变量统计均不显著,表明家庭内部的残疾人或病人并不会造成幸福感的显著下降,这首先是因为这样的家庭数比例较低,其次也与适应理论相吻合,即个体有较强的适应性,任何不利的影响在一段时间之后对个体的影响都会降到很低。

在经济状况解释变量中,人均年收入变量的回归系数在三个地区中均显著为正,表明增加收入的确会提高被调查者的生活满意度。住房面积的回归系数在北京市和河北省显著为正,表明家庭住房面积越大,农民报告生活更幸福的概率越大。但住房面积变量在辽宁省的统计不显著。住房结构的系数只在河北省显著。调查结果显示,河北省的住房结构平均值为1.96,而辽宁省和北京市的住房结构平均值分别为2.68和2.72,也就是说,河北省的被调查农民居住的房屋结构较大比例仍然是砖木结构,而辽宁省和北京市的房屋已经偏向于砖混结构了。这表明在房屋质量较差的情况下,房屋结构的改善会显著提高农民的幸福;但北京市与辽宁省在这一因素上并不显著是由于房屋质量已经较好,房屋质量的差异并不能对幸福感产生显著的影响。是否享受社会保障变量的回归系数在辽宁省显著为正,是否享受社会保障变量的回归系数在北京市和河北

省不显著。这一系数为正说明享受各种社会保障的农民有更高的幸福感。按照边际效用理论,越是贫困的人享受到社会保障以后幸福感应该越高。但是由于三地享受到各种社会保障的人数比例过低,被调查者中只有 5 % 的农民能够享受到社会保障,因此,这一变量的计量结果不具有代表性。

3 结论

通过对以上调查数据的计量分析,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在经济变量中,收入对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房屋面积、住房结构在一定程度上都会对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产生影响。

第二,在家庭结构变量中,子女数量仍然在影响着传统地区农村居民的生活幸福感,而家庭成员的数量以及家庭成员的状况对生活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明显。更完善的农村养老制度是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提高的必要途径。

第三,在个人特征变量中,性别、年龄、受教育程

度对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的影响显著,健康状况对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完善的医疗服务、合理的医疗保障制度均可以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幸福感。

通过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改善农村居民的居住条件,引导和推进农村居民向农业外转移,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增加农村地区较高质量的医疗卫生服务,提供更加全面有效的公共服务,提升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更好地实现城乡统筹和区域统筹,可以有效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幸福感。

参考文献

- [1] VEENHOVEN R. Is happiness relative? [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991, 24(1): 1-34.
- [2] FREY B, STUTZER A. What can economists learn from happiness research? [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2, 40(2): 402-435.
- [3] 风笑天. 社会学研究方法[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134-135.
- [4] 彭代彦, 吴保新. 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和农民的生活满意度[J]. 世界经济, 2008(4): 79-85.

Research on Factors Influencing Happiness of Rural Residents in Regions with Differ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in China

Li Xiang¹, Li Binglong¹, Zhang Hengchun²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3, China;

2. Research Center for Rural Economy,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Beijing 10081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about 1033 peasant households residing in Beijing, Liaoning and Hebei,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happiness of rural residents in regions with differ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in China by the ordered logic model. The result shows that: income, health state and satisfaction for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system hav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mpacts on the happiness of rural residents in all regions; the factors, such as gender, education level, marriage status, housing area and so on, have different impacts on the happiness of rural residents in regions with differ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in China; the factors, such as religion, family size, physical condition of family member, elderly needs to support, have little impacts on the happiness of rural residents in regions with differ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in China.

Key words: happiness; satisfaction of life; rural resident; influencing factor